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中国历来重视粮食安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储粮备荒、粮食安全治理等在内完备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

从战略上重视

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源于重农思想。中国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诗经》《周礼》等先秦典籍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重农思想。《诗经·唐风·鸛羽》借农夫之口发出“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的感慨,表达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周礼》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要求地方官员对农业生产进行督促检查,“以教稼穡,以稽功事”,“简稼器,修稼政”。先秦时期的管仲更是将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粮食生产不仅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财富的源泉、进行战争的重要物质支撑,而且是提高人们文明程度的物质基础,即“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秦统一后,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颁行天下,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得到贯彻。汉朝十分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历代皇帝和一众士大夫都以农为天下之本,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粮食安全对于国强民富的重要性,“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晁错则在《论贵粟疏》中强调粮食安全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汉末至隋代,社会动荡,灾害频发,致使国家和人民经常处于粮食危机的边缘,人们更加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粮食问题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将发展农业作为首要政务。适逢安史之乱的刘晏切身认识到粮食安全对固国本、养民生的重要作用,主张从粮食生产、流通、储运、抗灾救灾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 赵纪萍

贡献。

明清时期,人们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徐光启强调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王夫之则强调粮食安全之于人们生存和国家政权巩固的重要性,提出“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于谷帛”。冯桂芬结合清代中晚期人口增多、粮食紧缺的情况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指出粮食不足导致的经济贫困是激起农民起义、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储粮备荒

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降低农业灾害风险,保障粮食供应。储粮备荒思想在灾害频发、战乱不断的古代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粮食生产囿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基本上处于一种“靠天收成”的状态,粮食生产的季节性、波动性加之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直接决定了粮食储备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由此衍生出储粮备荒的传统。《诗经》中就有很多反映重视粮食储备的诗句,如“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等。《周礼》也强调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主张政府提升储粮备荒能



力以保证粮食正常供应。

管仲进一步发展储粮备荒的思想,主张建立粮食分级储备制度来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常平仓”的构想。所谓“常平仓”,即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在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以平抑市场的粮价。从汉代设置“常平仓”开始,历朝历代的“常平仓”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常平仓”制度是我国粮食储备制度最大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

秦汉时期,贾谊、晁错等人进一步探讨储粮备荒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贾谊引用管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说明备足粮食对安定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说明储粮的必要性,指出古代善治天



下者必定重视粮食生产和储备,“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晁错则提出“边食足以支五岁”以及“令入粟郡县”等储粮建议,这些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后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充盈了国家粮食储备。

宋元时期经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威胁,人们更加注重储粮备荒,丰富扩展了储粮备荒思想的内涵。范仲淹另辟蹊径提出以工代赈,通过向富人提供服务使饥民获得就业机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宋董煟则在《救荒活民书》中提出选择储粮主体要有所侧重,以藏富于民为主将粮食分储于不同的主体,即“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以更好地发挥

储备粮赈灾救灾的作用。

粮食安全治理

粮食安全治理思想,即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落脚点。古代中国不仅从观念上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而且着重探讨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形成了较完备的粮食安全治理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从政治、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探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形成了粮食安全治理的雏形。后世历朝历代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展丰富粮食安全治理思想,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粮食安全治理思想。

首先,推行重农抑商制度,提高粮食产量从源头保障粮食安全。重农抑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虽然历朝历代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目的指向却是一致的,即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秦统一后,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立法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设置农官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切实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汉初则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农民徭役赋税负担,提高农民粮食生

产积极性以增加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唐代刘晏则主张根据粮食丰歉调整税赋,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保护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及粮食生产能力。

其次,实施“富安天下”的政策,增加粮食生产劳动力确保粮食安全。汉代贾谊、晁错等人认识到增加农业劳动力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殷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才能“畜积足”、“天下安”。贾谊强调用行政手段促使百姓归农,以达到“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则主张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粮食价格,即“贵粟政策”,促使劳动力流向粮食生产部门,即“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再次,重视“藏粮于技”,主张以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在以技术创新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元世祖堪称典范。他极为重视传播和普及农业知识和技术,主张用先进的农耕技术指导农民耕作,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保障了粮食安全。他授命大司农搜集天下的农桑之书,编辑成《农桑辑要》并颁布天下,结果“用之则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此外,这一时期,郭守敬编制了当时最先进的《授时历》,随后出版了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祯的《农书》等。这些书籍的刊行,促进了先进农耕技术大范围的传播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确保了粮食安全。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秦汉时期初步形成,隋唐时期趋于完善,至宋元明清时期最终成熟定型,既积淀形成了丰富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也蕴含着丰富的粮食安全治理智慧和经验。



《资治通鉴》论用人

□ 赵瑜瑜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是继《史记》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史学巨著,因此有“两巨著春兰秋菊,雄视千古;两司马双峰并峙,流誉天下”的美誉。《资治通鉴》书名取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璀璨结晶。其中,《资治通鉴》对于如何选人用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蕴含着丰富的用人智慧。

为治之要 莫先于用人

《资治通鉴·魏纪》有言:“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之所难也。”在司马光看来,治国理政首要的任务便是选人用人,这甚至成为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资治通鉴·汉纪》中记载了刘邦夺取天下后与群臣之间的对话,刘邦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群臣各抒己见,然而刘邦却回答:“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餉,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同时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则是“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由此可见,颇具领导智慧的刘邦之所以取得天下,就是因为他知道谁是人才以及如何运用人才,懂得知人善任,具有强烈的人才意识。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资治通鉴》开宗明义第一篇是三家分晋,司马光又进一步追溯到引发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更早的一个事件——智伯之亡。当时掌控晋国大权的有四大家族,除了韩、赵、魏,还有智氏一族,而尤以智氏家族的权势最为显赫。族长智宣子决意立智瑶也就是后来的智伯为

继承人,而族人智果坚决反对,认为:“瑶之贤于王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其一不仁。夫以其五贤鄙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但是智宣子不听劝告,执意立智伯为继承人,果不其然,不仁德的智伯最终导致智氏一族覆灭。而司马光将智伯身死族灭的悲剧归结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由此引发了司马光对于才与德辩证关系论述的一篇史论,也就是著名的《才德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才德论》中关于用人导向最核心的观点。司马光认为一个人的“才”是没有指向性的,“德”才是把控方向的,因此有“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这样的千古名句。同时《资治通鉴》中把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种,并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无才无德的愚人作恶如乳狗扑人,但有才无德的小人作恶,会如虎添翼,危害更甚。

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资治通鉴》对于唐太宗的评价非常高,称其为“千古一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用人策略。《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唐太宗令大臣封德彝举贤的故事,“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其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大臣封德彝的意思是自己兢兢业业寻觅良久,但并未发现才能出众的奇才,而唐太宗则认为人才使用的关键在于知人识人,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周纪》记载子思荐苟变的故事同样阐明扬长避短的用人原则。苟变是大将之材,卫慎公却因其在



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而弃用他。子思不以为然,认为“夫圣人之官人也,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所以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木材有长短曲直之分,但是直的可以做车辕,弯的可以做车轮;长的可以做栋梁,短的可以做拱角,无论长短曲直皆皆有用处。人才同样各有特点,或果敢、或谨慎、或活络、或踏实,取其所长,兼而用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用,“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三字经》中的刘晏是唐朝神童,也是理财名臣,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声名卓著。刘晏早年入仕,久经历练,出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提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刘晏堂堂宰相之位,曾有送礼不成的小事,却还留下一段佳话。

天下之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晏的下属李廌出身皇族,时任尚书左丞,一向廉洁自律,生活淡雅。刘晏曾去李廌家中探望,看到房屋的门窗破旧,便令人暗中测量了门框宽度。刘晏回去之后,以此为根据,请师傅用普通竹子编制,做了一副不加任何装饰的门窗,准备恰当的时候送给李廌。但是,刘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携带着这份不起眼的礼物,曾三次来到李廌家门前,反复思虑后仍然不敢贸然叫门,没能送出这份薄礼,最后不了了之。

刘晏送礼,盖有三奇。一是给下级送礼。古时尊卑分明,唐朝尤重门第。刘晏为长官,李廌虽是姻亲,但为僚属,上级关心下级,倒也平常,但主动登门拜访,主动给下级送礼,还斟酌再三,这样的情况实属少见。二是礼实心更实。刘晏送礼,礼物实实在在,心意也是实实在在。精心准备、不动声色,但不为拉拢、不为权谋,毫无心眼、只为实用。以门窗为礼,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份薄礼,普通人人家礼尚往来,也可以花费得起。三是为他人着想。刘晏少年早慧,久在宦海历练,可谓人情练达。李廌素有清德,为了能让他收礼,刘晏定制门窗时,特地交代不加任何装饰,使其朴实无华,符合李廌家中风格。三至李府而未入,徘徊反复而去,是为他人着想。刘晏从李廌角度出发考虑,收礼有违清名,不收有悖人情,与其让人为难,还不如不为。在刘晏心中,他人声名重于自己面子。

给李廌送礼,可见刘晏私德,凭借自身治理才能给国家送“大礼”,更可见其公德。玄宗之后,大

唐屡经乱难,国力萎靡不振。受任困顿之际,刘晏秉公为国,持正理财,一方面主张“养民为先”,坚持“广养薄取”;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可谓雪中送炭,有效改善了大唐中期国家财政,堪称治世良臣。

安史之乱后,水陆运输不通,京畿严重缺粮,他洞察当时漕运积弊,祭出变革“三板斧”。一是官办漕运。“不劳丁男,不烦郡县”,并以工代役,杜绝了“船头”中间盘剥,既予民实惠,又压缩了运输成本。二是优化路线。比较古今运输方案,大力疏通汴水、入黄河转渭水、再到长安的最优路线。同时,分段接力运输,各段设立储备粮仓,由散装改为袋装运输,既降低了风险,又增加了运力。三是自办船厂。工利器器以善其事,刘晏沿水道设立多处官办造船厂,根据不同水域,建造不同船只,适应各种流速和水深。例如,平底浅仓的“歇榷支江船”适合水流平稳的汴水,小而坚固的“上门填阙船”可以应对水流湍急、遍布暗礁险滩的三门峡。经过刘晏整顿的漕运,每年江淮输送长安的粮食达 100 万石,基本满足了京畿运转所需。

在刘晏的为官生涯中,比整顿漕运更加精彩的是改革盐政,其全局谋划、系统布局、精巧筹措,令人叹为观止。安史之乱后,食盐专卖制度已经弊病丛生,盐官为害、盐商厚利、百姓吃亏。刘晏兼任盐铁使后,高招频出,皆中肯綮。一是实施“就场专卖制”。“亭户”作为生产者没有了生产定额限制,可以自由生产;国家统购,集中控制了货源,应收各项税费直接计入盐价,取消各地盐税关卡,压缩盐官寻租空间;盐商从专场购得食盐,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自由销售。一波操作之后,“亭户”、国家、盐商三者都能得益。二是平抑盐价未雨绸缪。自由流通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为了防止奸商抬高盐价,刘晏在重点区域设立“常平盐”两万石作为战略储备,一旦盐价波动异常,就果断出手调节市场。对于囤积居奇者是极大震慑,有效稳定了

刘晏送礼

□ 东方

市场预期。三是以物易物打通经济大循环。当时市场流通不均,部分盐商缺乏购货资金,军队缺乏制作服装的绢。刘晏刻意抬高绢的收购价,鼓励盐商用绢替钱,进行实物易货交易。此举不仅扩大了食盐销售,解决了军服原料问题,还令绢的生产者开辟新的销售渠道,社会商品减少了中间损耗环节,经济循环得到进一步畅通,可谓神来之笔。

刘晏长期主管财政,两度担任宰辅重臣,过手之财无数,始终能保持清廉本色,以门窗为礼可见一斑。为国理财,妙计百出,子孙家产,从未挂怀,“理财者”家无余财。唐德宗继位之后,刘晏受奸佞构陷,不幸遇害,家中唯有“杂书两车,米麦数石”,时人震动,“天下以为冤”。国计已推肝脑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或许是刘晏最真实的写照,青史当以为记。

